

余潇枫◎主编

人、国家与安全治理

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理论

HUMAN, STATE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李开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丛书 ■

余潇枫◎主编

人、国家与安全治理

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理论

HUMAN, STATE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国家与安全治理：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理论/李开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161-0228-2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 IV. ①D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6292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mslxx123@sina.com)

特约编辑 孙大伟

责任校对 刘晓红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59527(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8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丛书在继《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译丛出版及《非传统安全研究》杂志创刊后又与读者见面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又一标志性进步。

2010年的BP泄油事件、2010与2011年的北非动荡、2011年“3·11”的日本复合性灾害等接踵而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能不让人们对“人类安全”的境况与前景深怀忧虑，也不能不让人们对政府的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充满期盼。可以说，非传统安全不仅是时代发展的新主题、外交提升的新议题、国防建设的新难题、学科研究的新问题，而且还是每一个国家所必须面对的全球治理与社会管理的新课题。特别是当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时，更是对政府安全治理能力的考验。

安全既是一种“优态共存”的状态，又是一种“共同治理”的能力。如果说传统的安全维护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刚性的制度设计与硬权力应对，那么非传统安全治理则更多体现的将是柔性的能力建构与软权力的运用。这一以能力建构为标志非传统安全治理，包含着调动和安排不同行为体的能力，整合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平衡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的能力，以及达到特定政策结果的能力。事实上，以区域性组织为主导的多种行为体广泛参与的欧洲安全治理模式、以多种行为体在不同层次进行协作为特征的拉美安全治理模式、以协商渐进与功能性合作为特色的亚洲安全治理模式，都是提升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国际实践。

本丛书聚焦于安全治理的“能力建设”，应该说是在非传统安全理

论研究的概念界定、问题排序、特点描述、专题刻画、对策思考基础上的积极推进。但这一探索尚是初步的，有待于学界同仁们的关注和批评，也有待于各类安全研究者及工作者的共识与投入。但愿本丛书能为我们党和政府目前重视加强社会管理、倡导建设“平安中国”提供理论的参考，为一切有志于让社会和谐在中国实现的仁人志士们奉献思想的灵光。

余潇枫

于求是园石流斋

2012年1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安全理论:从传统到非传统	(1)
一 安全理论的框架	(1)
二 现实主义与传统安全理论	(6)
三 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兴起	(12)
四 本章小结	(18)
第二章 哥本哈根学派	(19)
一 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19)
二 宽领域的研究议程	(25)
三 地区安全研究	(35)
四 本章小结	(43)
第三章 批判安全研究	(48)
一 何为批判安全研究	(48)
二 国家安全批判	(52)
三 解放与安全	(57)
四 人的解放与安全共同体	(62)
五 本章小结	(66)
第四章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	(70)
一 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	(70)
二 女性与安全	(77)

2 | 人、国家与安全治理

三	性别视角与安全研究的重建	(82)
四	本章小结	(87)
第五章	人的安全研究	(89)
一	人的安全研究的兴起	(89)
二	争论中的人的安全研究	(95)
三	人的安全研究的理论化努力	(104)
四	本章小结	(108)
第六章	非传统安全理论:反思与前景	(113)
一	理论特征	(113)
二	研究贡献与不足	(120)
三	安全治理与非传统安全	(128)
四	本章小结	(133)
第七章	新国家、新治理	(135)
一	具体场景下的人的安全	(135)
二	国家的作用及限度	(142)
三	以人为目的的安全治理	(150)
四	本章小结	(157)
参考文献		(159)
后记		(167)

第一章

安全理论：从传统到非传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诸如哥本哈根学派、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一大批不同于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登上历史舞台，安全理论领域已形成“传统”与“非传统”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但是，到底什么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非传统安全研究或理论主要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只要是冷战之后出现的安全理论，都可以纳入“非传统”的范畴。这样的划分相当简便但有失严谨，因为冷战结束之前的安全研究事实上也是多种多样的，非只有现实主义一家。如以冷战的结束为划分传统与非传统的界线，那置同样出现在冷战结束前但迥异于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于何地？而且，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安全理论无论从核心概念、思想渊源还是从价值取向上看均大异其趣，有必要将它们分门别类，而不是笼统地归入“非传统”的大篮子里面。安全理论从“传统”发展到“非传统”，不只是意味着一些视角、方法上的花样翻新，更不只是意味着出现时间的先后，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重新思考与超越。基于这一点，笔者拟对非传统安全理论进行比较严格的界定，其目的不但是争取使安全理论的学术谱系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勾勒，发现并了解可能潜藏在其中的未来安全研究的新趋势。

一 安全理论的框架

对国际关系领域来说，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安全

与权力、利益等一起，均是国际关系学科中最为基础的概念。用麦克斯韦尼（Bill McSweeney）的话说，自1945年以来，安全研究可能是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次领域。^①但如果用来描述安全研究的重要性，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研究不但是一个有专门学者加以研究的次领域，也是一个绝大多数学者均难以回避的核心问题。正如有台湾学者所指出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的理论发展与安全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无论主流抑或非主流的国关理论，皆有对安全研究做出丰沛讨论和贡献。”^②即使是那些一般并没有被认为是安全研究领域的学者或其理论，也往往不得不对相关安全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例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但其代表性学者布尔（Hedley Bull）也在其专著《无政府社会》中用了专门一章来谈及“战争与国际秩序”。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专门研究国际伦理问题，与安全相关的核伦理、正义战争则是它的重点研究内容。由此可以粗略地说，有多少种国际关系流派，就有多少种安全研究的范式或理论，以及多少种理解安全问题的基本视角与立场。

那么，如何来理解、比较如此众多的安全理论呢？这就需要我们整理出一个安全理论的基本框架。只有通过这样一个框架，才能把所有的安全理论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分析，我们也才好对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理论进行比较，并由此发现理论演进的线索与意义。

布赞指出，“自国际安全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产生以来，该领域内的争论基本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产生：（1）安全的对象是什么？（2）安全问题是内在因素驱动的还是由外来因素驱动的？（3）将安全限制在国防领域，还是应该向其他领域扩展？（4）安全研究该基于何种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思想？（5）安全研究应该选择怎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③甘地·巴伯（Kanti Bajpai）则认为，在安全研究中，分析者必须回答下列问题，最核心的是两个：谁的安全（se-

①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

② 蔡育岱、谭伟恩：《人类安全概念之形塑：建构主义的诠释》，《政治科学论丛》2008年第37期，第56页。

③ [英] 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19页。

curity for whom) 以及何种价值的安全 (security of which values, 如领土统一还是个体的福利), 另外两个问题则包括: 来自什么威胁的安全 (security from what threats, 如疾病还是战争) 和通过何种方法维护安全 (security by what means)。^①

两种框架有共同之处, 如都把安全指涉对象即谁的安全问题当作安全研究的首要问题, 另外, 对安全相关价值或涉及领域的关注也具有类似性。但比较而言, 笔者更倾向于采取巴伯的框架。这是因为, 布赞所提出的五个问题, 特别是第二个和第五个问题表明, 他总体上是把“安全”当成一门学科而非一种理论来分析。学科也以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但它不但包括理论, 还包括研究理论的方法, 同时还要探讨学科本身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正因为如此, 布赞在把安全作为学科探讨时, 不但把安全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包括在内, 还要探讨“安全问题是内在因素驱动的还是由外来因素驱动”。但本书仅研究安全理论, 而非安全学科, 所以巴伯而非布赞的框架更加适用。

特别要强调的是, 理论或方法都是一门学科的组成部分, 某种理论也可能与某种方法有联系, 但方法本身不是理论。理论主要是对实体问题的解释, 更多的与主体论相联系。而方法则是对研究路径、程序和工具的探讨, 更多地侧重于认识论与方法论, 它可以与任何实体理论结合起来。在国际关系学科, 这种理论与方法的混淆尤为严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把建构主义当作一种理论, 而且还是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理论。但实际上, 建构主义本身仅是一种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approach) 而不是一种理论 (theory)。^② 一些建构主义学者也间接地承认这一点。如库芭科娃 (Vendulka Kubalkova) 和奥鲁弗 (Nicholas Onuf) 等人就认为, “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具体的理论, 它并不想解释事物何以按自身方式运转的原因。建构主义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本体论, 以及一种对世界的重新描述。因此, 它不带任何内在的意识形态特性。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可以被添加到由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主宰

① Kanti Bajpai, “Human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Kroc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August 2000, p. 9, http://www.hegoa.ehu.es/dossierra/seguridad/Human_security_concept_and_measurement.pdf.

② Nilüfer Karacasulu and Elif Uzgören, “Explaining Social Constructivist Contributions to Security Studies”, *Perceptions*, Summer-Autumn 2007, p. 29.

的国际关系研究行列中的又一种‘主义’。”^① 主流建构主义学者温特 (Alexander Wendt) 也说, 他的理论体系最好被称为“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方法”。^② 霍波夫则得出结论: “如果它 (建构主义) 是一种理论的话, 它也是过程理论, 而非关于实质结果的理论。要成为后者, 建构主义必须采纳一些政治理论使其运作起来。”^③ 作为方法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互动, 认为世界物质因素必须通过观念这面棱镜的折射来起作用。但到底世界是由什么观念起作用, 建构主义持开放性的态度, 所以温特提出无政府状态有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 某一时期的国际社会具体处于何种状态, 是由国家观念互动决定的, 简而言之,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④

之所以要特别对理论与方法加以区分, 也是考虑到对非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严格界定的需要。就以建构主义而论, 在安全研究领域, 许多人是把它列入非传统安全理论范畴的。但它真正的意义在于方法的突破而非实体问题的创新 (事实上, 正如本章第三节所分析的那样, 建构主义在许多安全观点上更近于现实主义), 并没有真正达到“非传统”。要真正判断谁是传统谁是非传统, 必须根据对安全实体问题的判定来回答, 而这正是巴伯框架的内容。

但巴伯的框架亦少了重要一项, 即由谁来保障安全 (security by whom), 这一问题与通过何种方法来维护安全有联系, 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 有必要单独列出。因此, 一种完整而清晰的安全理论必须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解答:

1. 安全的指涉对象, 即谁的安全问题: 是国家? 个人? 还是人类共同体?

① [美] 温都尔卡·库芭科娃、尼古拉斯·奥鲁弗、保罗·科维特主编:《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 肖锋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前言。

②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39 页。

③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8, p. 196.

④ 参见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2. 主导的安全价值：是保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样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还是维护经济福利、社会团结与认同之类的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抑或其他？多数学者的安全概念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缓和与珍爱价值（cherished values）的威胁。^①但这种价值到底是什么？不同学者不同理论则有不同的回答。

3. 威胁的来源：战争，冲突，疾病，还是饥饿等？

4. 安全的责任主体，即谁来保障安全：是国家？个人？非政府组织？还是全球性国际组织或某种超国家的安全结构？

5. 实现安全的方式：是军事机器？外交谈判？还是经济发展？

正如巴伯所言，安全的指涉对象与主导价值是安全研究领域的两大基本问题，其他三个问题都是从这两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只要某种理论确定了自己的安全指涉对象与主导价值，关于要应对哪些威胁？依靠谁以及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安全一般就有了相应答案。比如说，如果把安全指涉对象确定为国家，主导价值确定为领土完整，那么相关理论就必然特别关注外来军事入侵问题，因为它往往会危及到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要防止军事入侵，显然不能寄希望于无兵无枪的非政府组织，只有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自身及其盟友才是可以依赖的坚定力量。至于它们打击入侵、捍卫安全的方式，则当然少不了军事方面的手段。但如果把个人确定为安全的指涉对象，把个体福利确定为主导的安全价值，那么就完全是另外一套推理：发展水平滞后、流行性疾病和跨国犯罪可能是比外来入侵更为现实和紧迫的威胁，而各种公民组织可能是在国家之外照顾个体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则是比大规模的军备建设更为有用的实现安全的方式。所以在所有的安全理论中，安全的指涉对象与主导价值是两大基本问题，也是任何一种安全研究或理论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就非传统安全理论来看，它在这两大问题上是否有别于传统安全理论，是否提出了自己的特色论述，是衡量它是否有资格成为严格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理论，以及判断其理论创新价值与学术意义的根本性指标。

^① Paul D. Williams,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1.

二 现实主义与传统安全理论

非传统安全理论是对传统安全理论的背反，要理解前者，有必要对后者进行简要的论述。一般认为，现实主义是最主要的传统安全理论。在许多论述中，现实主义被当成是传统安全理论的代名词。还有一种认识，即将冷战结束之前出现的安全理论称之为传统安全理论，此后的安全理论则归入到“非传统”安全理论的阵营。但如果真要从时间的先后来区分传统与非传统的话，就会发现“传统的”安全理论远远不止包括现实主义安全理论，而且其安全范式也绝非统一。

按照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脉络，其实早在现实主义占据学科主导地位之前，就存在理想主义的安全理论。一战结束之时，国际关系正式成为一门学科，而最先登场的就是理想主义。根据理想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的集体安全占据重要位置，当时的国际联盟就是按此来设计的。同时，制度、道德甚至是教育都被当成是避免战争、促进安全的重要手段，这跟后来的自由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在思想上有着更多的契合之处。只是在经过了希特勒和二战的教训后，自由主义式的观点丧失了信誉，现实主义巩固了作为理解安全的主导理论框架的地位。^①在整个冷战时期，现实主义继续统治着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它所主张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政治安全成为公认的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但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与之前相比，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研究变得更加狭隘和僵硬。^②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现实主义也未能一统天下。首先是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它力求减少或消除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使用，强调和批评存在于军事战略特别是核战略中的危险；它虽然也关注如军控与裁军、军备竞赛等军事领域相关问题，但

① K. M. Fierk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07, p. 29.

② David A.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100.

批评把个体安全置于一边、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做法。^①与现实主义主要在美国、西欧相比,和平研究的影响力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国家(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在内的北欧地区)。这样的地理位置可能制约了和平研究的影响力,但丝毫不能阻止它成为一种迥异于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还有就是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的兴起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挑战。当时的越南战争和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使人们对经济议题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学者们开始质疑军事力量的效用,而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与经济相互依存的其他议题,如第三世界的贫困和环境问题,也开始吸引公众的注意力。^②与之相应的是,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越来越为人们所注意,安全研究领域也不再一味强调那种零和式、针对他国、关注军事冲突的国家安全了。另外,20世纪70年代安全研究术语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国际安全’开始取代原来常用的‘国家安全’概念。这一变化反映了学术界和政界这样的共识:当代安全问题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换句话说,对安全构成的威胁不仅来自于国外,而且,各种国际威胁相互影响,安全研究常常需要考虑威胁产生的多种国际背景。”^③可以说,自由主义部分是对理想主义安全传统的回归,强调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非零和性,强调合作是可以实现的,国际制度因此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自由主义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时时把安全一词挂在嘴边,但其基本思想与逻辑无疑为安全理论提供了另外一个指向。

以上例子告诉我们,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应该建立在对基本安全问题的不同回答而不是某个国际关系的时刻点上。把冷战结束之前的安全理论视为“传统”,而把冷战结束之后的安全理论视为“非传统”,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够严谨的。现实主义确实是最典型的传统安全理论,但它不能代表冷战结束之前的所有安全研究。如果默认冷战结束为划分“传统”与“非传统”的临界点,那么传统安全理论事实上将成为一个不同理论的杂合体。如果仅以现实主义为传统安全理论

① [英] 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17页;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6.

② K. M. Fierk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07, p. 20.

③ 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1页。

的代表，那又置理想主义安全研究、和平研究以及自由主义安全思想等于何地？而且，以冷战结束来划分还容易导致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给人造成冷战结束之后现实主义就结束了其主导地位的错觉。事实是，尽管现实主义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与各种新安全理论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后冷战时期的主导安全研究范式。

因此，尽管“传统”与“非传统”等词有着强烈的时间暗示，我们还是必须抛弃那种以冷战结束这一时间刻度来划分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做法。根据安全理论框架，区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标准主要是两个：国家是不是首要的安全指涉对象？是不是以军事和政治安全为主导安全价值。布赞也曾提出，国际安全研究从传统安全研究转向非传统安全研究有三个标准：是只专注于军事威胁还是将其他种类的威胁也纳入“安全”的考虑范围？是仅将国家作为安全的对象还是将其他实体也作为安全的对象？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客观认识论还是将后实证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也作为理解国际安全研究的合理途径？^① 不过，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第三个标准是方法上的而非理论上的，而前两个标准则正好与本文的标准相契合。根据这两个标准，那些把国家当作首要安全指涉对象、以军事和政治安全为主导安全价值的理论将被列入传统安全理论的范畴。而那些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强调军事和政治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则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应的理论则是非传统安全理论。

有人可能说，为什么不是相反呢？把强调国家安全的理论当成非传统安全理论，而把那些视个人为安全指涉对象的理论当成传统安全理论不可以吗？考虑到理想主义安全思想还出现在现实主义之前，这种主张似乎也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人类安全思想发展的整体发展过程。那就是：在国际关系学科出现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现实主义安全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理想主义安全思想也是作为对近代欧洲军事安全的背反而出现的。由此来看，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分确实有其时间上的含义，但其根本区分仍然基于某种实体标准：那种以国家为主要指涉对象、主要涉及军事和政治安全的安全问题

^① [英] 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19页。

为传统安全问题,对其进行研究、分析的理论则是传统安全理论;相反的则是非传统安全理论,而那些介于两者之间则可称为半传统安全理论。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我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主要把非传统安全问题归结为“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之外,对主权国家和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①。这实际上是在安全指涉对象上仍然主要采取传统安全的做法(强调主权国家),只是在主导安全价值上向非传统安全靠拢,这在理论上是不到位的。

以此论之,现实主义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传统安全理论的典型。作为国际关系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传统,现实主义奉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思想家为先祖,又不断从当代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那里吸收营养,从而发展出不同的流派,主要包括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和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现实现实主义。根据福尔克(Richard A. Falk)的概括,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特征是:(1)强调一定领土、拥有主权的国家是国际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角色;(2)相应地,强调国家间关系的竞争和冲突特点,战争仍然是解决冲突的选择,以及在战争中获胜被当作是衡量政策和领导是否恰当的首要标准;(3)相信国家是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行为体,但承认理性常常被政府内的官僚政治所扭曲,不会真正顾及他国或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福利;(4)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倾向,即忽视国内社会和政治环境对国际关系冲突和安全的本质的影响,与意识形态、信仰和领导地位相比,传统现实主义把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客观环境视为更为重要的国际历史驱动力量;(5)最后,对任何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暴力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的计划持悲观态度,但同时即使面对核武器扩散和地区强国间冲突更加密集的前景时,也对维持全球稳定的可能性感到乐观。^②而新现实主义的特征则包括:(1)经典现实主义,至少是被结构主义者修改后的经典现实主义,是分析国际安全关系适宜“焦距”;(2)承认国际经济政策这一额外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当它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可控制的行为模式时

① 黄昭宇:《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本质及解决路径》,《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第60页。

② Richard A. Falk, "Theory, Realism, and World Security," Michael T. Klare and Daniel C. Thomas eds., *World Security: Trend &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 11.

(这一行为模式源自这样一种假设：对互利框架或机制的参与，从长期来说对调节国际关系的关键方面是有利的)；(3) 核困境和增长中的世界经济活动的结合，使得国际关系专家把这些有利于合作的因素植入到他们对国际安全领域的概念化努力之中。^①

可以看出，作为较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更多地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思想，也愿意吸收自由主义强调的经济因素，其研究路径也由个体的还原论转到结构和体系层次。但正如斯奈德 (Craig A. Snyder) 所指出的，无论现实主义怎样变来变去，其一些核心理念是始终不变的。第一，他们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角色。第二，现实主义者将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权力，视为国际生活中最突出的特征，国家必须依靠自己来保护其利益。第三，国家都将最大限度地寻求扩大其权力或安全。第四，国家在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要奉行理性政策的。第五，国家将倾向于依靠威胁或使用军事力量来保证其国际政治目标的实现。第六，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相信，国际体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是基本国际政治格局和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形成原因。^② 正是根据这些共同理念，我们可以概括出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1. 在安全指涉对象上，强调国家的安全。现实主义把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主体，也认为它是首要的安全指涉对象。它可能不会贬低但往往故意忽视人的安全地位，或是认为人的安全能够与国家安全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不必对前者另加考虑。如新现实主义认为，在霍布斯式的世界中，国家是安全的首要提供者：只要国家是安全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就是安全的。^③

2. 在主导安全价值上，强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国际安全》的编辑们在 1976 年夏季出版的第一期《前言》写道：“我们把所有对民

① Richard A. Falk, "Theory, Realism, and World Security," Michael T. Klare and Daniel C. Thomas eds., *World Security: Trend &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 13.

② [澳] 克雷格·A. 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徐纬地等译，吉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8—69 页。

③ Kanti Bajpai, "Human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Kroc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August 2000, p. 36, http://www.hegoa.ehu.es/dossierra/seguridad/Human_security_concept_and_measurement.pdf.